

诗探索

POETRY EXPLORATION

主编／吴思敬

第4辑 理论卷



YZLI0890118495

诗探索

理论卷

2011 第4辑

主编 吴思敬



YZLI08901184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探索. 2011. 第四辑. 理论卷 / 吴思敬主编.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108-1269-9

I. ①诗… II. ①吴… III. ①诗歌—世界—丛刊
IV. ①I106.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3123号

诗探索 2011 第4辑 理论卷

作 者 吴思敬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3.5
字 数 255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269-9
定 价 50.00元 (全二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1 编者的话

// 口语诗研究

- 4 我说“口语诗”……伊 沙
- 7 论“现代诗”与“口语”……徐 江
- 10 “丑的字句”与“口语诗”……陈 亮

// 中国新诗：新世纪十年回顾与反思

- 18 世纪初诗歌（2000—2010）八问
——沈 奇、陈 超、罗振亚、赵思运、吴投文、
张立群、霍俊明、刘 波、卢 桢、杨庆祥

// 杨牧研究

- 48 边地苦难中的灵与肉
——杨牧诗歌片论……燎 原
- 59 西部铸雄魂，豪唱大风歌
——杨牧诗歌创作导论……彭惊宇
- 67 杨牧意象
——析杨牧的《余烬》和《铜剑鞘》……章亚昕

// 骆一禾研究

- 72 “一个人去建造一座教堂”
——骆一禾诗歌研讨会录音整理……西渡、张珏等
- 95 精神与文化的背负者
——骆一禾论……闫 文
- 107 作为弱者的存在
——析骆一禾的《生为弱者》……赵 辰

// 吉狄马加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辑

112 民族诗人和世界公民

——在“全球视野下的诗人吉狄马加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立陶宛]托马斯·温茨洛瓦著 刘文飞译

117 诗歌是一种梦想

——再读吉狄马加……高兴

126 作为“少数”的少数民族诗歌写作：以吉狄马加为例……西川

135 石堆导致的梦魇

——读吉狄马加的诗《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屠岸

141 天地广阔，万物自在

——读吉狄马加的名诗《自由》……树才

// 结识一位诗人

146 “你在时光中学习擦亮一道光芒”

——黄礼孩诗歌论……霍俊明

161 诗歌，倾听微细的声响

——由黄礼孩《芒果街魔法》所想到的……王士强

165 铁栅栏，诗人应该抵达何处

——黄礼孩《去年在朝鲜》随感……红色李白

169 诗歌的陌生感……黄礼孩

// 姿态与尺度

172 用词语提取事物的光

——马新朝诗歌论……程一身

183 读适民的诗……谭家健

// 诗人谈诗

188 重读闻一多《诗的格律》……万龙生

// 外国诗论译丛

194 《嚎叫》审判过程及其美国智慧的彰显

……[美]乔纳·拉斯金著 李嘉娜译

编者的话

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诗歌的兴起，口语诗歌铺天盖地而来，这其中有优秀的篇章，但也有取消深度、取消难度，流水账式记录生活，粗鄙、无聊的“口水”之作。因此，对“口语诗”写作做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口语诗，什么是口语写作，在当下还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为此，本刊特辟“口语诗研究”专栏，本期先发表伊沙、徐江、陈亮的三篇文章，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

诗人杨牧从十几岁就流浪到新疆，承受了内地同龄人罕见的苦难，也让他的生命在艰难中淬火，从而成就了我国新时期一位重要的新边塞诗人。1980年，人到中年的杨牧参加了《诗刊》社首届青春诗会，并以《我是青年》表达了青春被延误的一代人的心声，蜚声诗坛。本期发表的燎原的文章，并未以杨牧早期作品为主要论述对象，而是重点评述了杨牧的自传体文学《西域流浪记》和系列组诗《边魂》。他认为，杨牧放弃了那些给他带来极大诗歌荣耀的题材与主题，而潜下心来，集中精力于自己内在生命的关注，打捞生命中情感的沉船，这才是本真生命中的杨牧。这一见解对观察杨牧其人其诗，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诗人骆一禾1989年逝世，迄今已有22年了。作为海子的最早倾听者和批评者，其诗歌观念和审美趣味，对海子的影响不可低估。骆一禾不仅是优异的倾听者，同时也是出色的歌唱者。他的诗不仅有年轻人的热情与敏锐，更有哲学家的豁达与大度。他怀着强烈的使命感，走在修远的诗的天路上，尽心竭力地在为当代人构筑一个精神的“屋宇”。2011年4月2日上午，诗人西渡编选的《骆一禾的诗》出版发布会暨骆一禾诗歌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举行。诗人生前友好、诗人、学者20余人共聚一堂，缅怀诗人生平，研讨诗人的创作成就。本辑刊发的《“一个人去建造一座教堂”》，记录了包括骆一禾

夫人张珏在内的与会者对骆一禾诗歌创作和研究状况的深刻论述，对推进骆一禾的研究当有重要参考价值。

2011年8月5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学》杂志社、《世界文学》杂志社、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球视野下的诗人吉狄马加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国内外诗人、评论家、诗歌翻译家一百余人与会。吉狄马加曾说：“诗歌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倾诉，作为一个彝族诗人，写诗是我一生必须坚持的事业。” 在中国当代诗坛，吉狄马加以他浓烈的彝家血液，开放的世界眼光，锐敏的语言感受力，创建了一座独特的彝人的诗国。本刊特从研讨会论文集中选发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以及高兴、西川、屠岸、树才等人的文章，以飨读者。

在本辑的“结识一位诗人”栏目中，推出了70后诗人黄礼孩。在当代青年诗人中，黄礼孩以极大的热情与精力编辑民刊《诗歌与人》，组织诗歌活动，显示了为诗歌而奉献的精神，为当下诗歌的创作与研究做出了贡献。黄礼孩不只是诗歌民刊的编辑者和诗歌活动的组织者，同时也是一位70后的有代表性的诗人。本辑刊发的霍俊明的《“你在时光中学习擦亮一道光芒”——黄礼孩诗歌论》，全面阐述了黄礼孩作为70后代表性诗人的意义。对黄礼孩两首诗的赏析，则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黄礼孩作品的风貌：《去年在朝鲜》呈现诗人的理想情怀以及对民族、历史、国家和政治的反思；而《芒果街魔法》则通过对于生活中某种微弱的声音的倾听，对诗人的内心隐秘做出了富于诗意的表达。

// 口语诗研究

我说“口语诗”

伊 沙

“口语诗”这个概念在汉语诗歌的语境中头一次富于尊严感和挑战性的被提出来，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风起云涌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此前，外在勉强具备这一征候（内在追求也许南辕北辙）的作品，要么被当作“百花齐放”的最后一朵，要么备受歧视地被当作“历史个案”来对待，因此我从来都拒绝用所谓“白话诗”、“民歌体”或上溯王梵志的方式来搅这个严肃的局。

“口语诗”是一个现代概念，是现代诗的一大分支，并非有史以来所有具有口语倾向或口语化诗歌的大杂烩。

“口语诗”这一概念诞生的背景正是“第三代”主体诗人所带来的第一次口语诗浪潮，它由1982-1985年诗人们的地下写作实践（我视上海诗人王小龙写于1982年的《纪念》为“口语诗”的开山之作），通过1986年“两报大展”以及在此前后主流媒体对其做出的“生活流”误读而给予的肯定从而占得舆论的上风，它的新鲜感赢得了业内同行的追逐效仿，它的可读性赢得了一般读者的喜欢，1986-1988是“口语诗”写作迅速升温终至泛滥的两年，是“口语诗”的第一次热潮。

1989年是个拐点。历史的大事件与诗史的小事件终结了自1978年《今天》创办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原本处于热潮中的“口语诗”一夜失语，让位给借死亡事件而甚嚣尘上的海子式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现代汉诗的发展出现了诗学上的倒退。广西民刊《自行车》上一幅“不许倒退”的画代表着当时有识之士的心愿。

整个90年代，“第三代”中幸存的以及新起的“口语诗人”借理论界盛行

的“后现代热”来与“死亡崇拜”、“历史崇拜”所带来的“知识分子写作”做舆论上的抗衡与对峙，用文本上的不断创新来完成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演进（而非倒退回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1999年爆发的“盘峰论争”正是这两大潮流十年对峙所积压的矛盾外化的典型表现。此后，以“口语诗人”为实体的“民间写作”再度占得舆论的上风，“口语诗”的风格特点和“口语诗人”的存在方式也十分自然地与新世纪到来后的“网络时代”相交，由此带来了“口语诗”写作的第二次热潮，这个热潮至今方兴未艾——如果不是这样，它不会成为一大热门话题。

据说，“第三代”是80年代在对“朦胧诗”的反动中来确立自己的，可是韩东在当年就曾呼唤“朴素”和“第一次抒情”；据说，“后现代”是在90年代对“前现代”的解构中来确立自己的，可是我在当年就曾强调“要说人话”——如此表述我是试图打破人们一谈及“口语诗”时那种不走脑子的“后置”思维，似乎永远是先有什么然后我们针对什么才做了什么。今天我们所谈论的现代诗范畴内的“口语诗”从来就不是一种写作的策略，而是抱负、是精神、是文化、是身体、是灵魂和一条深入人性的宽广之路，是最富奥秘与生机的语言，是前进中的诗歌本身，是不断挑战自身的创造。迄今近30年来，现代汉诗中的“口语诗”走过了自发刳到成熟的过程：前期带有欧化译体特征的拿腔拿调的叙述已经走入后期脱口而出气血迸发的爽朗表达；前期以文化观念来解构文化观念的笨拙而机械的解说已经走向后期置身于生活与生命原生现场的自由自在；前期日常主义已经走入后期的高峰体验；前期语境封闭中的软语和谐已经走向后期大开大阖的金属混响——汉语诗歌也由此获得了一个强健的“胃”，由“口语”的材料铸成的一个新器官，它的消化功能开始变得如此强劲：一条由语言的原声现场出发，增强个体的“母语”意识，通过激活“母语”的方式而将民族记忆中的光荣传统拉入到现代语境之中，从而全面复兴汉诗的道路——已经不是说说而已的事，它已在某些诗人的脚下清晰地延伸向前——这是一条诗歌发展的康庄大道，它由所谓“口语诗人”踏出自艺术规律的必然。

我曾发问过：既然我们“口语诗”老被“另”出来拎出来谈，那么“非口语”又是什么形态的语言？书面语么？书面语难道不是非原创的现成语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的写作是无视并且回避语言的原声现场，他在语言上的趣味不是关心泉眼何在而是拧开自来水管，我起码可以说这是一种抱负低下的写作吧。理论上辩不清的反对派通常会拎出几个门都没摸着文学青年的浅陋习作来作为对“口语诗”的攻击，此种方式堪称下流，全然无效。

从浪漫主义抒情诗到现代主义意象诗再到后现代主义口语诗，西方人走过了几百年的路，台湾人从50年代开始走后两个步骤，大陆人从70年代才开始走，因为是在赶，用几十年时间走人家几百年的路，所以你会在一个时间段看到这几种诗型并存的“奇观”，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从国际上来说，我感觉现代主义意象诗与后现代主义口语诗还是并行存在的，只是写意象诗的一般都是老诗人，写口语诗的一般都是中年以下的，当然还有二者杂糅的风格。浪漫主义抒情诗几乎已经绝迹，我想大家都会觉得：它很老土、已过时，这没什么可论证的。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已经死亡的抒情诗，没有人骂，还常常被当做苛责其他形式的标准；濒临死亡的意象诗再难懂也没有人骂，还常常以有技术有难度自居，唯有口语诗，天天有人骂，时不时便抓住某个不入流的人物恶搞一下，但它却越活越旺，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成为世界潮流。或许是老被批评，“口语诗人”便很注重“口语诗”的完善与发展，拿我个人来说，新世纪这十来年的写作，在坚持口语大风格的同时，很注意吸纳并再造意象诗的技巧和跳跃性，这在我自《唐》已降的作品中，是不难看出的。我在编评《新世纪诗典》时发现：诸多漂亮的意象出自“口语诗人”之手，这是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的。

论“现代诗”与“口语”

徐 江

人类的文明演进得越久，我们使用的词语便越充满歧义。于是，那些过于严肃的人不得不在开口说话之前，先廓清他们要谈及的基本概念——以免被同类参差不一的理解力，将话题引向幼稚或不知所云。

关于我所谈的“现代诗”，早先曾在《论现代诗》的上篇《“现代诗”与“新诗”》里作过论述，这里只重申它最关键的五个指标——

1. 有没有一个智性的审视世界的眼光；
2. 有没有明确而自觉的语言建设指向；
3. 有没有将“抒情”、“抗辩”、“玄想”、“解构”、“反讽”、“幽默”等个性指标置于诗歌合理性下的综合能力；
4. 有没有将简洁（或透过繁复的外在，呈现出直指人心的穿透性力度）作为追求诗歌境界的最主要目的；
5. 有没有将在所有既往诗歌传统中被奉为最高指标的“人文”、“哲思”、“情怀”诸元素，严格控制在诗歌本身所要求的简约、含蓄、凝练之中，而不让其产生喧宾夺主式的泛滥。

这五项指标不是我个人的发明和臆造，它也是自“五四”新诗诞生以来，历代先锋诗探索者、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汉语诗美学的建设者们，共同希冀和追求的一个方向。“现代诗”在“五四”以来的新诗里，是一个独立而冷峭的自足性传统。它隐性地来源于青年时期的郭沫若、周作人、徐玉诺、废名，乃至稍后的戴望舒、艾青；显性地呈现于当代网络与民刊上一部分激进并充满自我严苛的诗人。我所谈及的“现代诗”，指向的正是汉语诗歌的这一脉络，它横跨着现当代文学，但又不简单依附、受制于任何一章文学断代史。

关于我所谈的“口语”，准确的表述则应该是——“口语平台上的现代诗”。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我手写我口”——因为从小说到散文，从政治标语到商业广告，直到今天臭遍网络的微博，完成“心口合一”式（至少表面上这样）书写的文字，已然比比皆是。它们与“诗写中的口语”最大的不同，就是过于强调语言和书写行为的工具性与社交性，而这两个倾向，恰恰是“口语平台上的现代诗”一直竭力规避，且时刻自查、自省的。

现代诗里的“口语”与日常的口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在书写的同时，能够进行自我提纯。那种把方言、时尚用词、网络用语随意搁置在诗行中的做法，充其量只能看作是某些水平不高、天赋有限者的一次冒险或试验。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更靠近人们所说的“口水诗”，本质上与“诗的口语”无关。两者犹如《水浒传》中“李鬼”和“李逵”之间的关系。

诗歌中的“口语”不是生活口语的原样，它们永远要经过作者天赋和其诗歌美学的剪辑与润色。纯天然的口语，多数时候在诗歌中呈现的是散漫，只有挤掉它身上的水分，现代诗对天然与自由的追求，才能得到充分亮丽的显现。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对“口语诗”的诟病，基本上来自于两个群体：一、持泛学院诗观的写作者，二、传统新诗美学的信徒，以及对古典诗歌美学一知半解的古诗爱好者。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人发起质疑的现场依据，在“口语平台上的现代诗”面前基本是无效的。因为他们提到的大多数现象，其实也正是“现代诗”作者一直以来予以反对的，这些现象在一些时候，对“现代诗”起到了恶搞、矮化乃至妖魔化的作用。至于他们意欲借助于攻击“口语诗”来强调和确立的那些个人理念，则因为发言者缺乏对时代和汉语写作大环境的准确认知，而仅仅成了某种带有明显个人情绪化的、消费意义大于建设意义的语言狂欢。真正对“口语诗”有价值的批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口语平台上的现代诗”作者阵营内部。这中间包括了对叙述依赖的警惕、对世俗趣味拉低诗境的警惕、对“口语”受惑于公共性题材的警惕，以及对口语技术形成新的“语言桎梏模式”的警惕。

近十几年来，“口语”在“现代诗”的语言阵营里占据主流，不仅是因为汉语阅读和发表的网络化，而是由于“口语”确实比泛学院的“技术”、传统

新诗的“情感八股”，更容易激发写作者对“自由”和“个性言说”的追求。

“口语”在直抵读者内心的同时，有时会让读者和新作者误以为简单，进而技痒尝试，可尝试之后，却发现用口语写诗的火候拿捏，要比使用学院修辞或是传统新诗修辞难多了。这既是许多现代诗修习者的体悟，同时也证明了“口语”在现代诗写行为中复调的一面。

“口语”在“现代诗”中的垄断地位还会持续多久？这是暂时无法预测的。一来在“现代诗”的另外两个美学向度——“泛学院”与“意象”上，在表现“人的生存状态”、“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些题材上，都存在着表达上明显的短板；二来就是上面提到的，“口语”更容易激发写作者对“自由”和“个性言说”的追求。而对“自由”和“个性”的诉求，恰恰又是过往近一个世纪，汉语文学同时亏欠于作者和读者的。考虑到商业对当今人文的强大改装，以及诗歌在当代社会的彻底非功利性，对这种历史性亏欠的偿还，似乎也唯有“口语平台上的现代诗”能独力承担下去。不过我还是由衷希望，现代诗其他几个美学向度的作者，能及早完善自身美学的表达功能，一起汇入到解答时代命题的残酷考评中。

没有面临过竞争和仇恨的艺术，是容易速朽的。这是我的经验，也是我对现代诗的信念之一。

“丑的字句”与“口语诗”

陈 亮

于坚《便条集》中有一首诗：“早上 刷牙的时候/牙床发现 自来水已不再冰凉/水温恰到好处/可以直接用它来漱口/心情愉快 一句老话脱口而出/‘春天来了’”。

1922年，周作人曾引一位日本诗人的诗加以赞许：“在火烧场的砖瓦上/syoben（小便）起来，便深深的/感着秋气了。”^①

不难发现，20世纪初的这样一首日本诗竟同20世纪末中国的先锋诗有着让人惊奇的相似。于坚的诗是对“春天来了”的重新书写。春天来了，不由冰雪消融、春雷阵阵、鸟语花香，而由唇舌之间对水温的感知。春天从绚烂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重新成为与身体、生命相关的事物。周作人所引的诗，则是逃离了“秋诗”的系统，对秋天的重新书写。人如何感知秋天？乃是由小便浇到火烧瓦上，激起的蒸汽迅速凝结而“感着秋气”。所有关于“秋”的经典意象和经典情绪，都被这种极个人的、日常的体验抹去了痕迹。

这种诗意的相似可能会让人稍觉沮丧——因为诗人“pass”“拒绝”后开创的诗歌事业，也并不那么新鲜；却也会让人振奋——于传统中找到知音，更可确立自己在谱系中的位置。新事物“合法性”的确立，既从“断裂”中来，也从“承续”中来。胡适撰《白话文学史》，周作人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乃至康有为撰《孔子改制考》，都是为“破”寻找“立”之依据。

前引周作人所引的诗，来自于一场关于“丑的字句”的讨论。这场讨论由梁实秋批评周平伯《诗底还原的进化论》引发。梁实秋在文中批评当时的诗人对诗的内容“太不注意了”，“他们从没想过何者是美，何者是丑。西湖边上的洋楼，洞庭湖里的小火轮，恐怕不久都要被诗人吟咏了！即以现在的诗坛而

论, 什么‘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电报’、‘社会改造’(见《女神》); 什么‘基督教青年会’、‘北京电灯公司’、‘军警弹压处’、‘蓝二太太’、‘如厕’(见《草儿》)等等丑不堪言的字句, 都窜到诗里来了!”^①周作人(仲密)则认为所谓“丑的字句”可以入诗, 这取决于诗人的真实情感和兴发。针对梁实秋所说“小火轮”是丑的, 周作人说, 若一个人于小火轮上起兴作诗, 难道要用“夷舶, 方舟”等字眼么? 对于所引日本诗人的诗, 周作人甚至认为“小便”可直书出来, 不必隐晦地以“syoben”代之。“小便”都可以入诗, 世界上的事物都可以入诗。^②

“小便”入诗, 这在当代诗歌中已不属罕见。伊沙《车过黄河》中“一泡尿的功夫/黄河已经流远”, 已然成为了经典。“丑的字句”, 在当代诗歌中屡见不鲜。然而自“第三代诗歌”以降的“口语诗”热潮给人美学上的震撼, 还不能说已是往事。关于“口语化”的争论, 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可以说, “丑的字句”问题, 在中国新诗中从来没有取得过共识。

梁实秋对“丑的字句”的批驳, 是对新文学运动以来诗风平民化和诗语口语化的反拨。为求打破几千年来律令森严的旧诗体, 开创白话的新诗体, 胡适等人不能不极力强调新诗的自由, “新诗除了‘诗体的解放’一项之外, 别无他种特别的做法。”^③为求新诗的通俗易懂, 达意达得好, 胡适等人并不特别看重典雅之诗意, “我们现在做白话文章, 宁可失之于俗, 不要失之于文。”^④可以说, 在对白话诗的建构中, 胡适等人之实践, 更在证明白话为诗的可能性, 即为新诗开拓一片疆域。对白话文运动先驱者而言, “白话”就仿佛轰隆作响、一往无前的推土机, 由他们驾驶径直闯入小说、戏曲、诗歌之园地, 将旧文学的建制一并摧毁。而在此疆域上重新筑以房舍、植以园木, 则非一夕所能完成。

对于白话诗, 开拓者更强调“白话”, 强调新的文体对旧文体的反动和异质性, 强调新诗之“新”, 这不免在“诗”的营架上有所不足。胡适的诗, 乃至他所称许的俞平伯、康白情的诗, 确有啰嗦拖沓、平白无味的毛病。这自然引起继起的新诗人的不满。白话为诗的问题已为胡适等人解决, 不复为问题, “诗”话语问题就凸显出来。对于新诗人来说, 白话诗如何呈现“诗”作为特殊的人类审美物的特性, 才是他们要解决的。如果说胡适等人尝试的是“诗如何白话”, 那么新诗人努力去做的是“白话如何诗”。因此胡适等人力倡“诗

① 梁实秋:《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第二部分, 载《晨报副刊》1922年5月28日。

② 仲密:《丑的字句》, 载《晨报副刊》1922年6月2日。

③ 胡适:《谈新诗》,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 第397页。

④ 钱玄同:《尝试集序》,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第106页。

体解放”，而梁实秋等人却是要为诗约规、为诗赋形，纯洁诗的语言。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而梁实秋则不惮于在《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中说“诗是贵族的”。这话若在此前十年，怕只有林纾一般的新文学的反对者才说得出来。而至此，新文学已乘风破浪，来到另一重境界。梁实秋的反，正以此为基础和背景，这却是他要反对的先驱拓疆之功。

虽然因立论过于绝对，梁实秋在“丑的字句”争论中并不占上风，但自“新月”、“象征主义”、“西南联大诗群”，对诗歌语言的规范和纯洁化还是隐隐成为一股潮流。应该说，那种抒情的、浪漫的、典雅的，如梁实秋所说有“仙人境界”的诗，更符合一般的对诗的印象。

而至1949年后的近30年中，诗歌语言又为之一变。毛泽东于1958年提出的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寻找“中国诗”出路的主张，“基本上是一种不承认新诗已建立自身‘传统’的‘重建’的意识。”^①这种意识使得现代新诗史上的泰半诗人被选择性地遗忘，在这种意识统领下，诗歌只剩下政治抒情诗一种模式，等而下之的，又有“小靳庄诗歌”等伪民歌。若以梁实秋的眼光来看，这一阶段诗歌中“丑的字句”恐怕比比皆是，甚至领袖的经典诗词中都有“不许放屁”之语，还可由集体朗诵。

另一股潮流并非中断，而是在地下潜行。这尤见于食指、黄翔、“白洋淀诗人”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写作。而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这股潜流终以“朦胧诗”的名号涌出地面，蔚为大观，一时独领风骚。“朦胧诗”显示出匡正诗弊、重为诗歌正名的抱负。孙绍振说这些新诗人“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②，这无疑是梁实秋所谓的“仙人境界了”。有此境界，也就难免有精英气、贵族气^③，离“工农兵文学”远矣。在北岛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浓郁的诗歌中，在舒婷的呼喊爱和尊严的诗歌中，在顾城的幻想和奇趣的诗歌中，在杨炼和江河的“现代史诗”中，“丑的字句”自然难觅踪迹。

吊诡的是，在“朦胧诗”还在经受着猛烈批判、未获官方文学部门认可的时候，它已经被年轻的一代“经典化”了。而当来自官方的批判稍歇，“朦胧

① 见洪子诚、刘登翰著：《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②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载《诗刊》1981年第3期。

③ 汪剑钊认为“以‘白洋淀诗群’为基础发散而成的‘今天派’诗歌”受了俄苏文学的影响，芒克的诗接近普希金和叶赛宁，“高傲、敏感、对诗歌艺术的敬重，是多多与茨维塔耶娃共同的特点”，“如同普希金抨击沙皇专制精神，歌颂十二月党人的精神一样，北岛们的诗歌也渗透着强烈的公民意识和道德热情”。见汪剑钊：《“文革”中的地下诗歌》，载《湖南文史》2003年第12期。